

“365 党员服务中心·爱心超市”启示录

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楚慧芳 帖迪生 文 许大桥 实习生 徐宗福 图

核心提示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关心和爱护基层干部、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如何探索建立党内关怀帮扶机制，切实让党组织的温暖传递给每一名党员，增强党内团结，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管城区东大街街道办事处在辖区建立“365党员服务中心·爱心超市”，取得了良好成效，积累了成功经验和做法，给人们带来诸多启示。

创新政治关怀机制，让党员充分享受发展新成果

七一前夕，管城区东大街办事处对建国以前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进行走访慰问。

“老党员和困难党员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建立关爱帮扶是固本强基的内在要求，让他们充分享受发展新成果。”东大街街道党工委书记谷合群说。

居住在博爱街社区的庞振邦，今年80多岁，是上个世纪4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退休后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他既不要享受低保，也不享受优抚补助。77岁的王巧云，1983年开始在街道居委会工作，1955年入党，一直辛勤奉献到2003年。突然不做工作在家休息心里时常感到失落。像他们这样的老党员，辛苦工作一辈子，到了精神和生活如此冷落，实在令人心寒。

如何帮扶老党员，抚慰内心忧郁，排解心中苦闷，分享幸福时光，安度晚年生活，成为东大街街道党工委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



由老党员组成的巡逻队在社区巡逻。

再也不能让老党员奉献又伤心、流汗又流泪。去年6月，东大街办事处成立3个工作组利用10天时间，分头走进社区和党员家中走访座谈，详细了解党员的家庭、生活和身体情况，征求意见建议，体察社情民意，倾听心声苦楚，摸清下边实情。立马召开专题会议，经过一天一夜的磋商和研究，从党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探索关怀帮扶措施，解除党员的后顾之忧。

帮扶活动不能一时一刻、一朝一夕。当时，办事处党员数量365人，一年365天，用“365党员服务中心·爱心超市”，寓意坚持不懈，天天如此。谷合群解释说。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关怀网络实现全覆盖

“走访慰问献爱心，都是规定动作，年年都这样，形式单调，照顾面较窄，多数困难党员和老党员和组织接不上头，出现关爱盲区。”东大街办事处主任曹广凤介绍说。

为整合和利用现有资源，他们分别在6个社区设立党员综合服务站，建立健全困难党员信息台账和信息库，确定困难党员底数和基数，合理安排帮扶慰问对象。以设立“党员爱心互助基金”，开办“党员爱心超市”和发放“社区党员爱心购物积分卡”，落实党内关爱、帮扶长效机制，增强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坚定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的信念，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成为市区第一家集党员关爱帮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流动党员管理、党务服务为一体的党建工作新平台。

——“党员爱心互助基金”，关爱帮扶有保障。去年10月，“党员爱心互助基金”成立之初，裕鸿房地产公司、敖东制药、郑州市第一建筑公司和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纷纷捐款，城南南路“商都文化街”流动党员还设立“流动党员书画义卖角”，筹措党员互助基金，献上一份爱心。短短5天时间，收到社会各界捐助42735元。

——开办“党员爱心超市”，关爱帮扶有平台。在城南南路开办“东大街街道365党员服务中心·爱心超市”，辖区的1名老红军、3名建国前老党员、29名50年以上党龄老党员、23名生活困难党员每月可凭街道发放的不同面值的“党员爱心购物卡”免费领取30元-50元不等的的生活必需品。

——发放“社区党员爱心购物积分卡”，关爱帮扶有载体。辖区在职党员、流动党员在“党员爱心超市购物”时，凭“社区党员爱心购物积分卡”均可享受9.7折优惠和超市积分兑换礼品。每次购物消费额的3%由超市留存“党员爱心互助基金”使用。目前，已向辖区300余名在职党员发放了“社区党员爱心购物积分卡”。



义卖角拍卖字画的款项将全部捐给党员互助基金。



50年党龄的老党员，可凭党员爱心购物卡在爱心超市领取物品。

为规范使用“365党员服务中心·爱心超市”购物卡，他们对帮扶党员名额进行分配，每月30日之前，社区党支部按照审批的名单发放购物卡。受帮扶党员领取购物卡时，出示爱心积分卡，登记卡号并签字，注明卡号、名字和购物小票，党员爱心超市在每月26日前凭收取的购物卡、购物小票到办事处结算。

“爱心超市就像温暖的港湾，每月领物品时心里暖融融的。”塔湾社区的张兰英1988年退休后，组织关系转到了社区。她第一次来到“爱心超市”，领取物品后，以为就此一次呢，便随手把“爱心卡”丢到了一边，没想到，在次日社区党支部又把“购物卡”送到了家中，于是，她又向社区提出了申请，补办了新的“爱心卡”。“三个核桃两个枣”，也值不了多少钱，体现了心情和心意。

“爱心超市”承载关爱，爱心比黄金还珍贵

“爱心超市”承载着关爱，宛如桥梁和纽带，把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拉得更近了。东大街街道党工委坚持把关怀帮扶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作为党内活动的重要内容，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建立健全以激励为核心、以关怀为宗旨、以帮扶为途径的长效机制。

“党组织一直没有忘记我们！”社区残疾人李文军，1986年入党，下岗多年，靠打点零工维持生计。他来到“党员爱心超市”领取所需物品时，心情格外激动，逢人就讲：“爱心卡”就是“亲民卡”，党组织越来越近了。

“我退休多年，身体有病，不能为党工作，党组织不把我当外人，真是感激不尽！”家住南城里的刘福琴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党员爱心超市”开辟“专用通道”，每月登门，把生活必需品送到床前，嘘寒问暖，沟通聊天，排解心中苦闷。每逢元旦、春节、七一、国庆等重大节日，办事处特意安排走访慰问。她从电视上看到青海玉树地震消息，专门委托社区主任捐款500元钱，献上一片爱心。

扩大了社会影响，积累了成功经验，取得了丰硕成果。

推动了党内和谐，促进了社会和谐

“365党员服务中心·爱心超市”，是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和尝试，一年多的运作和经营，扩大了社会影响，积累了成功经验，取得了丰硕成果。

——增强了党员责任感和荣誉感。“过去老党员和流动党员，平时很少参加组织生活，更谈不上汇报思想了。”鼎新街社区委员陈春枝感慨地说。城南南路社区老党员义务进行书画培训、书法知识讲座、春节免费送春联，收到了群众欢迎。博爱街社区开办了郑州市第一家社区老年女子学校和“博爱家庭美德聊天室”，产生了良好社会影响。

——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亲和力。“365党员服务中心·爱心超市”丰富了党员活动内容，完善了党内关怀机制，使有困难的党员得到关心和照顾，在思想上、感情上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促进了党内民主与和谐。“党内帮扶机制的建立，不仅解决党员生活上的困难，关键在通过党内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营造党内以诚相待的浓厚氛围。”曹广凤解释说。“365党员服务中心·爱心超市”，架起了党员之间的“连心桥”，使得广大党员心情舒畅、团结协作、和谐共事，实现了党内和谐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和谐。

——理顺了关系，促进了社区和谐。在东大街辖区，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郑州市邮政局等公共单位，行政级别高于办事处，相互之间沟通很少，工作中经常发生掣肘现象。今年6月，依托“365党员服务中心·爱

心超市”平台，整合辖区资源，把辖区9家公共单位纳入区域化党建新格局，成立驻街道综合党委，理顺了与公共单位的关系，促进了社区和谐，增强了党在“两新”组织中的凝聚力和渗透力。

——化解了矛盾，推动经济社会繁荣发展。“365党员服务中心·爱心超市”运行以来，老党员和贫困党员得到了关心和照顾，积极参加公益事业，为社区建设建言献策，成立6支“夕阳红”义务巡逻队，发挥群防群治力量，排查矛盾纠纷95起，化解率达到90%，促进了社区和谐稳定，推动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激发党内活力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增强党员意识，激发党内活力，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尝试。”街道党工委书记谷合群谈及“365党员服务中心·爱心超市”，充满自豪和自信。

——启示之一：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党员是党内生活的主体，只有尊重和落实党员的主体地位，才能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提高党员主人翁意识。“365党员服务中心·爱心超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党员服务，让党员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增强了党员的归宿感和党组织的亲和力。

——启示之二：注重统筹兼顾，满足党员的合理需求。实践证明，“365党员服务中心·爱心超市”，畅通党员表达意愿的渠道，体现了党内温暖，党员把组织的温暖转化成巨大的发展和创业热情，强化了党员的理想信念。

——启示之三：注重示范引导，发挥典型的辐射带动作用。“365党员服务中心·爱心超市”，通过活动平台体现自身价值、展示先进形象、增强主体意识、密切党群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使每一名党员都成为党的活动的主角，以“细胞”的活力促进“肌体”的健康，使党永葆蓬勃生机。

新闻时评

新闻发言人是政治运作透明化的推手

6月30日上午10时，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举行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纪委、中组部、中宣部等11个中共中央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亮相。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任立家对此表示，这种形式比较新颖，动作较大，显示中央正在加快党务公开的步伐。（《第一财经日报》6月29日）

鉴于近些年来党务工作对外公开的步伐开始出现加快的迹象，实践层面出现中央和地方呼应的态势也就不足为奇。中共中央11个部门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虽非破冰之举，也未开中国党务公开之先河，但是考虑到这11个中央部门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有理由相信此举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政治运行透明化的进程。

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已经是日趋成熟的制度安排，它的好处不在于相关部门可以把哪些信息由上而下由内而外地发布出去，而在于公众可以通过媒体之口从相关部门获得当下热点问题焦点话题的回应和解读。在一个互联网信息时代，在网络民意瞬间升温，分歧仇恨即溢的情况下，这种及时跟进式的信息渠道的通畅程度尤为重要。

当然，如果把中共中央11个部门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也仅仅看做是一种顺应网络民意的举措，就太低估了此番举措的政治含金量。国人对于政治运作的种种无法判断的信息往往以“内幕”、“小道消息”津津乐道之，与此相应的是权力决策部门形象的模糊化、符号化。权力部门以这样面目示人固然可以因神秘感增加一些权威效应，但也容易因为缺乏透明度，使权威的行使蒙上太多权谋、算计的外衣，增加公众对政策形成的不确定感。

特别是在政府部门大幅度引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情况下，党委冷政府热而形成的不对称信息沟通模式，在中国现实的政治语境下，也会让人产生短板效应的遐思。

11个中共中央部门有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有了制度建设的探索问题，就有了整个部门运作进行必然调整以适应社会及舆论质询的需要。如此一来，新闻发言人制度就不简单是多了几个在媒体曝光官员的问题，而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抓手。从已经推行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执行情况看，从形似到神似，还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也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公众宜保持乐观其成的态度，看这些新闻发言人的出现如何带来耳目一新的政治新气象。 高峰

耻感缺失让官员肆意交流受贿经验

海南省海口市地税局龙华分局局长陈小涛在长达15年时间里，收下了几十家单位及个人上百次的贿赂款。从这位局长大人的自述看，其收钱已经到了以一种疯狂、无耻的境界，甚至与其上司交流分享收受钱财的经验，“我说趁着局里管理混乱，我们边收边交，那位上司则说应是边发边收。”（《检察日报》6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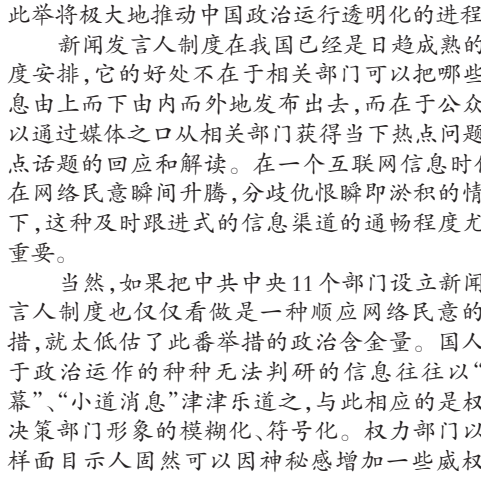
不管是“边收边发”，还是“边发边收”，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细微差别，并不能掩盖本质上的侵吞国帑。如何两手握重权的税官，交流的不是如何完

成好本职工作，不是合理挖掘税源、颗粒归仓，居然是怎样更多的中饱私囊化为私，也算奇闻。与中石化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同海和山东省省委原书记杜世成共享同一个情妇一样，这样赤裸裸的受贿经验交流，正凸显时下官场文化以及社会文化中的耻感缺失。

一个社会还是应该有些耻感的，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大家应该共同遵守一个底线。退一步说，即便做了贪渎之事，也起码应该知道羞耻、愧怍，而不是赤裸裸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的境界可以从上下两极考察。

上焉者，是创造和建设出理想的人生状态，解决“人应该朝什么状态发展”的问题；下焉者，则是划出三条禁忌的底线，解决“人起码、绝对不能做什么”的问题。

耻感消失的现状，应该是目前治理官员贪腐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这边厢，言之谆谆；那边厢，听者藐藐。陈小涛们不仅不以为意，反而相互之间“坦诚”交流捞钱心得，这算怎么回事？一旦“无耻”之门洞开，则人性的泯灭、价值的崩解、伦理的丧失都紧随其后，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胡斌



话说县级驻京办一年拉动经济200亿元

据6月30日《北京晚报》报道：“这天是县级驻京办撤馆的最后时限，随着数千名驻京办各种形式的销声匿迹，一个以驻京办为中心的巨大的市场正在萎缩。记者调查发现，仅这些县级驻京办，就能拉动经济达几百亿元。”

真没想到，驻京办的“大限”之日，竟还有媒体在拼命地为它鸣不平，试图让它回光返照，“起死回生”。不信你看，为了使自己的论点能“站住脚”，报道原引“驻京办情况的《驻京资讯》报社社长李罡对即将消失的5000家以上县级驻京办进行的“有鼻子有眼”的量化分析：住房

账60多亿元、伙食招待费7.75亿元、送礼开销30亿元、交通住宿20亿元……

可不是吗，在李社长的量化分析中，仅仅送礼一项就不得不让人信服。他说：“每年只计算春节、五一、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以及元旦这6个重大节日，如果给每位各级领导、杰出老乡、关系单位负责人等送500元的礼品，就按照200人计算，每个节日的礼品开销就是10万元。因此一年6个节日下来每个驻京办的礼品开销就是60万元，5000家驻京办就是30亿元。”说实话，30亿元人民币本身没有什么高尚

和不高尚之分，但如果让我来分析这30亿元蕴藏的内涵，那么，我觉得李社长说的这30个亿实在是耀眼的30亿元，闻不到丝毫的高尚——靠明码标价，公开送礼来膨胀壮大GDP，我看，没有也罢，这也是中央为什么要铁腕治理驻京办的深层动因。

驻京办不是“祝京办”。任何与反腐败、促和谐相违背的顽疾、毒瘤，必然要剔除而后快。大限来临，该“闪人”就“闪人”吧，岂止是一个《驻京资讯》的拉动经济200亿元的文章可以阻挡得住的呢？ 党贺喜

遏制公款旅游关键在执行

为明确政策界限，惩处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二条规定，对于组织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6月30日《新京报》）

在公款出国（境）旅游现象备受诟病的当下，中纪委发布这一文件当然是很有必要的。它再度亮明了中央惩处腐败的严肃态度。不过，依据常识，法规文件效力的大小，最终取决于执行力。

关于禁止公款出国旅游的行为，咱们的法律与纪律并不少，特别是一些纪律性文件，规定得很具体，针对性也很强。如果按照挥霍浪费国家财产的行为论处，还可以上升到法律层面。但现实情况大家都看到了，公款出国（境）旅游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原因显然还是出在执行方面。想想看，公款出国游又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通常涉及很多公务员及领导干部，难道让官员自己惩罚自己？假如让上级来处理的话，又面临着人情关系及“法不责众”的尴尬局面。

出国游不好处理，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常常披上出国考察的马甲。一旦有纪委来查，他们可以说，他们不是旅游，而是考察。即便是去沙漠中考察海洋，纪检机关又何曾较过真？去年广州海事法院去南非、阿联酋等四国，6人11天花掉487105元。他们称此行是考察海洋，但人们发现他们的出国路线只有沙漠。最糟糕的是，这件事情最后也不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不了了之。

我印象中，在金融危机爆发的那年，许多地方政府曾不约而同地表示，要削减出国考察经费，与民共度时艰。浙江省在2008年年底就高调宣布“各级领导出国考察经费削减20%”，这种表述的潜台词其实就是“出国考察是可以控制的”。我就想，如果的确是工作需要，出国考察的经费就不该削减；如果可以这么大幅度地削减，是否意味着许多“出国考察”其实并不是“考察”，而只是内部的一项出国指标呢？

公款旅游问题，一直都是地方政府公开的项目，所以，出国旅游与出国考察的区别，普通公众无从知晓，自然也就无从举报了。公众监督的缺位，无疑也会影响公款出国游的整治。我注意到，中纪委这次的文件解释，具体针对公款出国游的组织者，算是抓住了核心人物。只是，如果不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力量，不把出国考察的定义解释清楚，很难说，相关惩处措施落实到各地纪检机关不会走样。顺便再提一句：遏制公款出国游，别忽视了国内游，比较起来，后者可能更复杂。 椿樾